

“吊嗓”与“转磨”的鲁迅

鲁迅的小说和他的短文，在近十年来，的确是有一部分势力，所以有人曾拿“文艺界的权威者”的帽子给他戴过。他的文章和他令弟启明的清俊淡远正正相反，他是尖刻老辣。

最近报载他在上海被捕。有的说并不曾捕到他，他还在日本朋友家藏着。这自然是和所谓“普罗文学”有关了。

当此时，有位朋友便在发他的妙论了。他们道“谁叫他成天‘呐喊’，每日‘彷徨’？好好的叫唤什么？好好的又溜跄什么？假定逮捕之说属实，而今而后，也就用不着再吊嗓子（唱戏的人呐喊，谓之吊嗓），再转磨（无一定之标准而乱转之意。可作彷徨之俗译解）了。”

《呐喊》、《彷徨》，是鲁氏生平最著名的两部小说集，尽人而知。“呐喊”二字可代表其激亢，“彷徨”二字可代表其郁闷，而两集则固皆五年前旧作，又无与于所谓“普罗文学”也。

鲁迅恋爱

鲁迅先生一头长发，满脸胡子，想不到他有恋爱的事，最近青光书局出版了一本《两地书》，似情书而非情书，非情书又是情书。师生恋爱本很平常，但我认为其中最有意思

的就是他两人的称呼。第一封信许广平称“鲁迅先生”，自己署名“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称许广平为“广平兄”，不称女士而称“兄”，的确是别开生面，足见此公之个性与别人不同。数封信后便称鲁迅为“迅师”、“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而鲁迅始终保持严正的态度而称之为“广平兄”。直到最后几封信，才有点情书味，许广平称鲁迅为 E L · Deal，鲁迅称许广平为 H · M · D，关于信的内容则多研讨学问及论杂事者，绝无情书之味。倘此书若教情书圣手的章衣萍来写，则“亲爱的小宝宝”早上场了。

记鲁迅

燕居无事，常趋若雨斋周作人先生处品茗，兼亲教益，间亦听得鲁迅之轶事。鲁迅之真姓名为周树人，字豫才，其笔名甚多，如隋树森、隋洛文、唐侯、迅行、褚冠、申飞、色人等等，有如画史中大涤子别号之多。浙之绍兴人，十三岁遭家庭之变，贫甚，后进矿务学校，并留学日本。寓东京时，以提倡新文艺改造中国思想为己任。回国后，任师范中学教员。及蔡子民长教部，召为主事。迨老虎部长章士钊主教部，革其职。后即为南北各大学教授矣。民国十七年，因钱玄同劝告，乃从事创作。其《阿Q正传》、《呐喊》及其它作品，即可见一斑矣。先生常发表思想于南北各报之副刊。前数年又来故都，见友人即云：此番仍卷土而去。语至沉痛。然先生诲人不倦，上课时粉笔常夹于耳上。偶至街旁饭棚中，食玉

黍窝头、荞面条，与苦力一桌共食，欣欣然有喜色。事母极孝，与其妻（编者注：指前妻朱安）情不相融。某日，先生课毕返家，适其妻煮粥以俟，先生闻饭味即厌，怒问其妻曰：“胡所为者？”其母闻之，乃曰：“此余所作。”无已，先生佯喜同食。向夕其妻方拟铺被，先生即怒目相向曰：“胡用尔为？”力毁其床。后其母奔至，谓此为余所嘱。先生始无语。

鲁迅之《呐喊》不为其母赏识

鲁迅先生之母，周老太太，虽为一旧式女子，然亦系大家女，幼曾读于私塾。嫁后，于操持井臼之暇，亦常披阅说部。旧小说几于无书不读，新小说则喜李涵秋之《广陵潮》，杂志则喜《红玫瑰》。当鲁迅昔年居平之时，一日，周老太太谓鲁迅曰：“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及看毕，曰：“我看也有不足之处！”事载章衣萍之《枕上随笔》。

鲁迅避难诗

当杨匏安之被捕也，当局求鲁迅甚急。北平且传鲁已被捕，其母本由岂明先生迎养在平，闻讯大惧，百般探问疑终不释。鲁幸得其徒柔石自狱中来信有所暗示，遂携许霞女士

及其不满二岁之小孩，匿居小旅馆得免。旅夜不寐，有避难诗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墙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处写，月光如水照缁衣。”事后风云已静，鲁即来平探母，盖极度惊骇之余一面为快也。当时 北辰报（非北平晨报）谓鲁“卷土重来”，疑其另有作用，而鲁终“卷土重去”矣。

鲁迅的报复主义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如果是有着真理，那么鲁迅就是真理的例外了。有些人认为鲁迅最可怕的，就是他的不讲恕道，却提倡报复。这报复主义，鲁迅是至死不肯放弃的。他遗嘱的最末一条，就是教人报复的。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还有他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女吊》的最末一句，也是讲报复的。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止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怨’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这都是他将死之言。右脚踏在别人的身上生活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只怕脚底下踩着的那些人起来报复的人们看来，自然不算是善的，虽然《圣经》上也有以牙还牙，以口还口的话，而且孔夫子也说过“以直报怨”。然而鲁迅

的报复主义，却不自今年始，老早在他与许广平女士通信里，已就这样说过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办法，只好让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自己既已饿死，还要固执着，不让老虎吃他死尸，或死到临头还不忘反咬它一口，这种倔强报复的根性，不特是老虎和伥鬼们所深恶，就连同难的伴侣们也有认为是多余的举动。既然无救于死，反咬一口，岂不是徒增老虎的恶感，而且有失忠厚之旨呢。他们以为俯首帖耳的被吃，或可以博得老虎的欢心，求它少嚼几下，彼此省事，平安入肚，岂不好吗？

哀悼鲁迅先生

听见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像从光明中突然坠入黑暗里那样的恐怖与悲哀。编者要我写一点追悼的文章，提起笔来，却实在觉得这工作是非常艰难。在这样的时代，对于这位伟大人物的死，能说什么呢！一个伟大人物活着的时候，大抵有若干恶势力攻击他，嘲笑他，躲在黑暗里放冷矢中伤他，而真能认识这伟大人物的人们，一定是拥护他，站在同一线路上向那恶势力进攻。及至这伟大人物一死；那恶势力却也蹙起眉来故意做出戚然的样子，而且说出种种惋惜的话语，其实这几乎是等于欢呼的，他们对于那人物的死是高兴的。而真能认识这伟大人物的品格的人们，到此时却反而沉默，他们知道怎样踏着先驱者的足迹迈进，他们知道多

说只有空虚。

特别是鲁迅先生，在这数十年中用了坚毅的精神，满怀了对于人类爱护的热情，与一切“哈叭狗”斗争。他打败了多少“哈叭狗”，他也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生前虽然受了种种中伤与磨难，这些却也正养成了他那伟大的人格。他们中伤他，正因为他是黑暗中的火炬，可以照见了他们的丑恶相。现在他已不能言动，“哈叭狗”们该觉得可以出来跳动的吧！然而鲁迅先生的讽刺是依然存在的，并不会随了先生的死亡而消失。

一个人的死亡，渐渐会被大家所遗忘，然而有的时候也还会因想起他的言行而惊心的。鲁迅先生的死，将永远留给“哈叭狗”们以不快的记忆，他们将称这为“刻薄”。然而也给另外一种人以失去导师的悲哀。前者一定希望即刻把这伟大人物的言行忘却，以便更放肆的过着日子；后者却希望这位伟大人物的遗范永远存在，他们将从其中求得做人的方法。

因为刊物的性质的关系，在这里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些，假使编者对我还有什么更大的属望的话，我只好敬致歉意了。

周作人不薄胡适之

在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之先生原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胡先生曾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上，盛称周作人先生白话小品文的成功，说他是可以打破白

话文不能写美文的观念。在当时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们，原为的白话文通俗易懂，长于叙事说理，可以写应用文，而没有想到抒情写景方面，亦极优为之。十四年来白话文学的发展，倒是在文艺方面，成绩斐然，而应用方面，如公文案牍，反仍让文言文独霸一隅，白话文未能通用，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所以当初有白话文不能写美文的观念。在当时他们原是彼此推重的，后来逐渐分化。在《语丝》与《现代评论》对立开笔仗的时候，胡先生已经是接近现代派一旁的了。然而，意见虽不同，感情还未坏，尚不至于施行人身的攻击。直到去年蔡子民、杨杏佛等人设立人权保障同盟，胡先生入盟后，发现该同盟的活动是革命的，自己不愿参加，遂发表违反同盟宗旨的言论，致被除名。至此鲁迅对他就不客气，作诗说他：“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又因为他到长沙演讲，何健送他五千元旅费，更骂他“肯向权贵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就太露骨了。但是鲁迅虽是如此，而周作人却对他还好，并且有时还替他辩护几句，例如给曹聚仁的信就是这样说的：“□□□君的言论不甚入时，取憎于青年新人，亦是当然。窃意以为在不投机不唱虚伪的高调之点，或不无可取。故鄙人觉得不必过于责备，况即□□□君之低调，鄙人也唱不出也”。所谓□□□君者，即指胡先生也。

周作人相信命运

“关于命运”——这是知堂先生最近在文艺副刊上所

写的一个题目。知堂先生开头这样写道：“我近来很有点相信命运。”这句话实在表现了老年人们的一种悲哀。我这里所谓的老年人，是指那在历史已是感觉到自己迟暮的人。在历史上感觉到自己迟暮的人，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躲在神秘中去寻觅自己的安慰，像求神拜佛呀，崇拜灵性呀，相信命运呀，总逃不开这些圈套。如果说命运的话，那真可以说是一种命运——老年人逃不开命运。以上所引的是《芒种》上一篇批评周作人先生的话。周先生对此也有答辩：他说他的原文上所说关于命运，本来有个解释，命就是指“遗传”，运就是指“环境”。他是相信人生要受遗传与环境所支配，与八字生克的命运不相干。这话我们信得过。周先生无论如何感觉到自己的迟暮，但他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也决不至公开地信奉子平渊海，给王半仙李铁嘴作宣传。但是就是所谓遗传，环境的命运，它的支配力，也不是完全不可抗的。人类在不违反社会进化的原则范围内，是尽有改造环境的自由，否则历史上的革命将不可能了。老年人精力衰弱，意志消极，往往留恋过去，苟安现状，听天由命，畏见未来。自谓是与世无争，其实是躲避现实，自觉不自觉地相信了宿命论。这假科学的宿命论正不比八字生克的迷信为无害，它会无形中消灭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周先生的相信宿命，还有一句自白，他送白涤洲的挽联说：“有四方志，无四句寿命数奈何！”如果这种应酬文字是随手挥毫，倒也罢了，但周先生的写作是认真的。可知命数这个观念，在周先生的人生哲学中是确定成立了。

刘半农书李大钊夫妇墓碣之误

十四日上海《晶报》载有某君检举《人间世》第九期所刊之刘半农书李大钊夫妻墓碣中岁数的疑点的一篇文章，说：“……李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春秋三十有九；李夫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一。是李夫人年纪比李先生大十二岁，何以她生在光绪十一年，只比李先生早出世四年呢？”这真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所谓春秋若干，乃是说享寿若干，李氏夫妇并不是同时死的。李夫人既比李先生长四岁，李先生是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捕绞死的，如果李夫人比其夫后死八年，寿数自然可以多十二岁，这并不是年纪大十二岁。晶报某君的检举固然扑了个空，然而刘半农究竟也把李夫人的岁数推算错了。李先生生于光绪十五年十月，至民国十六年四月被杀，共得春秋三十九（论足岁实只三十七岁有六个月）是正确的，李夫人比其夫早生四岁，卒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比其夫后死六年，共比其夫多活十年，论寿数只有四十九（算足岁实只四十七岁有四个月）无论如何也算不出五十一岁来。但是据我想岁数还有生肖作参考，也是家人子女所习知的，大概不至于弄错的，有错便错在出生的年份上，因为八字上记的是甲子，不小心极易放错。我想李夫人大概是光绪九年生的，比李先生大六岁的吗？李先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墓碣必是将来金石录上的珍品，现在有这么个错误，我所以不惮烦的给覆核一下。至于人间世

言墓碑拓片为原大五分之一，其实应该说二十五分之一，因为图片的放大或缩小，是应该指面积言的。因此在此给他指正一下。

刘半农与吴稚晖

刘半农先生在百灵庙时，曾到山坡上去出恭，吟得两句颇有盛唐气味的诗句，叫做：“登山拉屎去，天地一茅房”，这自然又是在步吴稚晖先生的后尘了。本来刘先生一生滑稽，是拿吴先生做范本的。他因为吴先生自述作文章的秘诀是取法于“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一句话，便去寻出这句话的出处的何典来重印。写了一篇序，说到吴先生的滑稽处是在乎把任何天大的事情，都看得米小米小。这话是对的，例如去年江苏省政府改组，有新闻记者向吴先生探询消息，吴先生便说那是等于土地庙改组，无关紧要；又如前些年科学与人生观的一场大论战，吴先生作了一篇压阵的大文章，却只说是“柴积堆日黄中闲嚼咀”，而刘先生也说过当大学院长的光荣，还比不上一堆花生米来得有趣味。他们俩滑稽的妙诀，说来简单，便是把一般认为了不得的要事，看成狗屁不值；在拟于不伦之中，却包含着相当的真理。

吾爱吴夫子，萧闲晒日黄。滑同刘老老，稽赛汉东方。改组江苏省，重修土地堂。登山拉屎去，天地一茅房。

刘半农博士之死

晴天打霹雳似的，传出刘半农博士的死耗，这是给与中国学术界一个如何重大的打击啊。记得数年前在辽省的一个乡间，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刊物的目录有胡适之悼故友钱玄同的一个题目，心中难过了数日，后来才知道是游戏的文章。这回刘博士却真的死了，哎！刘博士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是中国难得的乐律专家，他运用现代音学的知识，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是有极深的造诣的。诗文翻译，犹其余事。他这回赴西北调查方言语音得病回平，遽尔逝世，可说完全是为学术牺牲的。据医生检查，他血中有螺旋菌，这是从蒙古内地不卫生的逆旅中，由虱子传染来的黄疸，回复热。可惜他自己太疏忽，回平后只请中医诊治。尚谓并不危险，及送到协和医院，则已把治疗的机会耽误了。我们想到他中年枉死，尤觉痛心。至少，至少，他应给我们学术界再多工作十年。

悼刘复博士

新文化运动健者刘半农先生，赍志歿矣！噩耗传来，实吾国教育界学术界之一大不幸也。

吾国新教育之基础工作，首屈一指当归功于范静生先生之长教育；而第二步之推进，则在蔡子民先生之长北大；时

先生适任教北大，为新文化运动健将之一。

先生名“复”，江苏江阴人，现年四十有五。清贫自守，不慕荣利。早岁在沪以译述欧美文艺小说，刊载报章杂志，名闻一时。陈独秀主撰之《新青年》，载其作品尤多。民六，蔡子民长北大，以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厉行改革，尤侧重于文哲各系，乃邀先生任教授。旋获资助赴欧洲研究语言音韵之学，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教育界要职，而始终未离北大，盖与北大自有其悠久历史在也。先生天资聪颖，性富诙谐，其作品亦如其人。其翻译之《茶花女》，前年冬曾由余上沅主持，公演于北平协和礼堂，博得观众极度美誉。今春复有《赛金花本事》之作，原约秋凉脱稿。此外作品散见于各刊物者，多以幽默论调，讽世规俗。最近赴平绥线，研究西北风俗方言。谁知出塞复入塞，因不服水土，染病而归。又以就医失时，竟至不起，伤哉！兹觅得其书札一函，于其华实并茂之字里行间，赞美“久大漱口水”之有益卫生，及自定《赛金花本事》之脱稿期。墨沈犹新，人已千古，抚今思昔，能不怆然！兹节录其友人任致远挽诗四首之一，亦以见其交谊之所在焉。

相逢海上廿年前，日草万言各绮言。

谁续子云铅槧业？岁时含泪诵遗篇。

洪深自述

我此次到北方来的理由，一是因为在上海住得太久，认识的人太多，生活太复杂，太不能够清静了。二是因为这几

年来，我身体忽然发胖，重到一百八十六磅，每天老远地跑到真茹和江湾去，还要演讲好几个小时，实在受不住。我从上月十八到了之后，原希望过一种比较安定、有规则、清静的生活。一方面忠勤于我现在所做的职务，一方面得到一点空闲的时间，将于从前所买而未读的关于艺术文学的书从容地阅读一下，并将历年所编写而未曾完工的文稿整理一番。决不欲再做一个公众注意的人，最好是完全没有人知道我来。可怜还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是失败了。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吃。

赵道生先生，不是就在起士林门口，当我低头疾趋故意走避的时候，一把拉住我的么！其余在紫竹林北安利等处，都总遇见老朋友旧同学，他们不会不传说出去，所以渐渐人家都晓得“洪深来了”。

但是我现在任职的地方，绝对不是大陆银行。我的地方，不愿意在报上宣布，也是胖子在疲倦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心理。说我在大陆银行任职是错误，我想明天银行也会写信来更正的。这虽是外面传闻之误，我却恐怕知道内情的人疑心我借著银行名义招摇呢。

至于星期三晚上，是明星公司的魏先生请客，约我招待客人。我因为贪吃的原故，十分起劲，但并不是我个人招待报界。固然，那天菜好，谈得更为畅快。这种聚会，我很希望能多有几次。但如果有人误会我在那里活动，我恐怕要被东家停歇生意了。

总之，我现在是个极安分，极需要清静的人。请社会上人，从我的艺术作品中认识我，了解我，而不要注重我个人。

邹韬奋狱中生活

邹韬奋案将于十一日开审，邹现押于苏州监狱。近有人往探，述其生活如下：

邹因为海内知名人士，故颇得当局之优待。所居之室，光线虽不充足，但颇整洁。壁上贴有邹亲笔所书之“无才应识我，多难始成人”一联。味联中之意，除发泄胸中牢骚外，尚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之慨。邹发甚长，不加整理，故面部颇露清癯，但精神甚佳。每日除按时写作外，并开始写一“狱中日记”。闻沪上各书店皆函邹，争相预约。但邹本人之意将仍交生活书店发行。此外，将作“七子蒙难录”一书。七子者即同时被缉之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及女律师史良等。

张恨水之言

老友名小说家张恨水君，以受新新电影公司主人韦耀卿君之约，来津参观其所著《落霞孤鹜》影片，晤之于国民饭店，记所谈之关于电影者如后：

恨水言：“我所作小说之摄成电影者，已有三种：即联华之《银汉双星》，明星与大华两家之《啼笑姻缘》，明星之《落霞孤鹜》是。《银汉双星》在平映演时，未曾一看，

因闻人言，去吾小说实太远也。故此次之《落霞孤鹜》，实为自己看自己的作品于银幕之第一次。此片中各演员之表情，能各尽其致，摄影技术亦佳，诚可佩服，惟故事中大节目，则略去不少，以三十余回之小说缩至两小时可以演完之影片，因不能不加削剪也。《啼笑姻缘》之酿成诉讼，诚为始料所不及。结果如何，不能预料。明星为此片，到平拍摄，共计耗费至十万之巨，全长至四十八本。到公映时，想必有较好之成绩。日前大华公司到平演《啼笑姻缘》话剧，其主持人曾邀往一看，但以事未果去，闻亦不尽与原作符合也。小说、电影、话剧本不是一回事，且经他人改编，更不易绝对的保留其真面目。至各片所得代价，则明星之《啼笑姻缘》，不过千六百元。《落霞孤鹜》四百元而已，《银汉双星》，则并无分文之获得也。人谓恨水发财，真不胜其冤枉，以笔耕而致富，恐天壤间绝无其事也！”

张恨水与其小说

林琴南的小说，曾卖到千字十元，现在只有张恨水的小说，曾卖到八元。像上海最有人缘的小说家周瘦鹃，也不过卖到千字四元至五元罢了。

自《啼笑姻缘》拍上镜头，北方小说家的头衔，逐加在张恨水头上。那个专写女人“白亮亮儿的屁股”和“拉屎撒尿”的玉田赵焕亭老先生，虽然纯粹是北方武侠小说作家，反倒屈居在后。究其实，恨水乃安徽人也。

张恨水名馨远，《春明外史》上之杨杏园，即其谐音自渝。又号哀梨，即影射外史之名妓梨云。张盖情场过来人也，现年届不惑，约民十以前到北平。今《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时主编《北京益世报》“益世俱乐部”版，以同乡关系，引张氏入社为校对，月二十五元。民十四，成办《世界晚报》，又扩充而出日报，延恨水主编“夜光”、“明珠”两副刊，作《春明外史》，《荆棘河山》刊之晚报日报，此其处女作也。民十六，世界社受压迫，穷极，张氏减薪，以一百元代价，包办两副刊，带作两小说，并写两小评，生活最窘困，乃兼为津沪报作通讯。平津易帜，《世界日报》销路激增，经济稳定，成既在南京创《民生报》，张君亦得伸足海上洋场，《啼笑姻缘》登新闻报，倚其日销六七万份之声势，大为公子小姐所爱读，严独鹤又为揄扬，恨水作品，由此大红。及南下游沪杭，洋场才子纷起欢迎，游西湖则题诗争和，其言动亦时见报端，曾未数年，张以一寒士，竟恃卖文成为富翁焉。张所作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啼笑姻缘》、《金粉世界》、《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未见）、《银汉双星》、《交际明星》、《短篇弯弓集》等。其情节大致相类，即带着伤感气氛，写多角恋爱、妒情、婚变……其结果必落在反团圆的悲剧窠臼内：死、吐血、发狂，或莫知所终。其精神仍是聊斋或金圣叹式的，其托体则不出《红楼梦》，《绿野仙踪》、《捉鬼传》等。

关于徐志摩之死

日前于某大学宴席间，谈及诗人徐志摩之死，颇多有意味之议论，因特志出以告读者。

据戏剧家熊佛西君云：志摩于死前一周，曾电告熊君，欲至其家午餐，熊君稍讶其突兀，但以系至友之故，亦即治膳以俟。迄午志摩来，出《诗刊》一册赠熊君曰：此刊中之作者已多数凋谢，如某某，如某某，历数其名，意态若深凄然。熊君素好诙谐，当时颇有调笑志摩之意。日后继者或将属诸君耶？语甫及唇，不审因何竟又自止，别后仅一周而难作，当日之事在在皆似成纤，亦奇事也。又是日熊君以下午曾邀友人来家作画，预磨有好墨，曾请徐君为书册页两帧，此或即为徐君之绝笔，亦未可知。

关于志摩所乘飞机失事之因，席间亦曾讨论。报载共有两说：一为气象报告迟误以致因雾触于开山；一为汽缸破漏，以致飞机堕落。据对于飞行有研究之吴郁周君云，汽缸破漏一说，决不可靠。因飞机飞起时，一定须经过相当之检查，驾驶人自亦须细心检视，无以自己性命为儿戏之理。汽缸设在飞起时毫无问题，设不触山，自然不能破漏。故以因雾触山为最可靠。不过因雾触山，亦不能怪气象台。因欲求气象台报告准确，非全国各地皆有气象台，形成一全国之气象网，各地息息相通不可。中国现有若干气象台耶？故报告不可靠，自难怪徐州之气象台矣。再者济南附近多山，其气候变化必巨，是以于中国今日乘飞机，实尚非安全之旅行法也。